

自发 理性 平民化 中国民意

在对外政策中的特点分析
(1999—2009) 赵海滨 / 著

SPONTANEOUSNESS, RATIONALITY AND PLEBIFICATION: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ublic Opinion in Foreign Policy (1999—2009)

自发、理性、平民化： 中国民意在对外政策中的 特点分析

(1999—2009)

赵海滨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发、理性、平民化：中国民意在对外政策中的特点分析：1999~2009 / 赵海滨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5012-5081-3

I. ①自… II. ①赵… III. ①对外政策—政策分析—中国 IV. ①D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3898号

策划编辑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贾丽红
贾丽红
赵 玥

书 名

自发、理性、平民化：中国民意在对外政策中的特点分析（1999—2009）
Zifa Lixing Pingminhua: Zhongguo Minyi Zai Duiwai Zhengce
Zhong De Tedian Fenxi (1999—2009)

作 者

赵海滨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65923（发行） 010-85119023（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880×1230毫米 1/32 8¼印张

字 数

193千字

版次印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081-3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选题意义和研究现状	1
第二节 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16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17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22
第一章 国际关系视野中的民意解析	25
第一节 民意与外交关系演变及相关理论研究概述	25
第二节 自由主义学派与现实主义学派	27
第三节 “民意”与“中外关系”的概念界定	40
第二章 中国民意走向前台 (1999—2003年)	48
第一节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矛盾与冲突	48
第二节 中国反美民意的持续增长	58
第三节 案例:“炸馆”事件中的民意作用分析	63
第四节 中国反美民意的特点	86

第三章 中国民意走向前台（2003—2008年）.....	91
第一节 中日关系的矛盾和冲突	91
第二节 中国反日民意的持续增长	97
第三节 案例：反日“入常”事件中的民意作用分析	103
第四节 中国反日民意的特点	119
第四章 中国民意走向前台（2008—2009年）.....	128
第一节 中国反西方民意的强势表达	128
第二节 案例：“抵制家乐福”事件中的民意作用分析 ...	137
第三节 中国反西方民意的特点	147
第五章 中外关系视野中的中国民意	158
第一节 中国民意的特点	158
第二节 中国民意的表达渠道	164
第三节 中国民意走向中外关系前台的多重因素分析	180
第六章 中国民意对中外关系的影响	196
第一节 中国民意在中外关系演变中的作用	196
第二节 中国民意影响中外关系的路径分析	203
第三节 中国民意影响力分析	209
第七章 结论	219
第一节 研究结论	219

第二节 政策建议	227
主要参考文献	235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和研究现状

一、选题意义

一直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从国家政府的层面去理解与探讨国际关系，认为国家是国际关系体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是开展外交活动的主体。这种理解不能说不对，但是不够完整和准确，因为它只看到了国际关系的政府层面，而忽视了国际关系的民间层面。应该明确的是，理论上，国家间的事务不仅仅发生在政府之间，而且还发生在民众之间，发生在民众与政府之间。然而，事实上，在对外交往中，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民众，其应有的作用与影响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发挥。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曾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是群众的智慧。江泽民说，好办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我们头脑里固有的，归根到底来自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胡锦涛强调：“尊重人民实践、从人民的伟大创造中汲取思想营养并上升为理论，

是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① 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不难发现，以上经典论述都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不仅是国内政治生活的行为主体，而且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应扮演着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那么，在国际政治实践中，人民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如何体现的呢？本书希望就此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和回答，以此引起学界同仁对该问题的更多关注和思考。

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当代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调整时期。由于冷战结束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加快了融入国际体系的步伐，并“已经开始形成负责任大国的外交风范”^②。在这一重要时期，中国民众的外交观念有什么变化？中国民意^③如何参与了外交活动？其外交影响和作用如何？怎样更好发挥民意对中外关系的建设性作用？本书将1999年到2009年中国民意影响中外关系的整体态势设为研究的核心问题，希望通过纵向的历史研究和横向的系统研究，发现并总结中国民意影响中外关系的某些规律性或模式化的东西。笔者认为，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

首先，研究中国民意对中外关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政府仍然处于中国外交体系的核心位置，是中外关系演变的主导力量，但是，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以

① 齐建华：《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五大因素》，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0页。

② 叶自成、李红杰：《中国大外交：折冲樽俎60年》，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③ “民意”（public opinion）在英文中也可以被翻译为“公众舆论”，西方学界包括中国学界的部分学者习惯于用“公众舆论”一词来指称民意。

及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民意已经逐步走向了中外关系的前台。从民意主体看，参与中外关系的民意主体展现出了自发、理性和平民化的发展趋势；从民意影响方式看，网络抗议和示威游行已成为中国民意影响中外关系的主要方式；从民意影响程度看，中国民意不但能够支持和助推中国政府外交，或对其形成压力和限制，而且能够逾越国家地理界线，对对象国政府及其民众产生影响。因而，面对已然崛起的中国民意，全方位、多层面揭示其对中外关系的影响和作用，对于明确民意在中外关系中的战略价值和意义，对于进一步引导和塑造中国民意，使之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目标实现和良好的中外关系维系的推动力量和建设力量，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研究中国民意对中外关系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民意对中外关系的影响已愈益明显，但相关学术研究却存在明显的不足。目前，学界对中国民意对中外关系的影响尚无系统性的研究，相关研究或者是从内政外交的视角简要论及中国公民关注和参与中国外交的种种情况，或者是从民族主义的视角论证其消极影响，但是对于影响中外关系的民意主体、民意影响方式、民意影响程度等一系列问题，学界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因而，笔者希望将这些问题纳入历史的研究视野，通过对1999年到2009年中国民意走向中外关系前台的历史进程以及期间三个重大案例（“炸馆”事件、反日“入常”事件、“抵制家乐福”事件）的观察和分析，对中国民意影响中外关系的某些规律和模式进行归纳、总结，这一历史的、系统的、全方位的研究对于弥补学界在该问题研究上的不足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二、研究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民意的崛起及其对中外关系的影响和作用的增强，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在逐步增多并不断深入。目前，学界主要从民族主义和内政外交两个视角对中国民意与中外关系进行研究和分析，并且在这两个研究方向上均取得了一些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外关系的研究

中国民族主义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重新崛起的中国民族主义，国内外学界从其兴起的原因、特征、类型、性质、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考虑到与本研究的相关性，本书只着重介绍海内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的研究。

许多海外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重新崛起的中国民族主义已成为国际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根源，是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的破坏性力量，因而他们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和忧虑。塞缪尔·亨廷顿就对中国意图“洗涤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屈服于西方和日本的耻辱”感到担忧。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罗斯·门罗（Ross Munro）认为，“在民族主义者的情绪鼓动下，（中国）产生了一股从过去耻辱中恢复过来的渴望；并在单纯渴求国际影响力的鼓动下，中国正谋求在亚洲替代美国而成为该地区主导力量。”甚至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这位老资格的中国问题专家也不无忧虑地表示，“中国新的、毛之后的民族主义不仅对台湾的自治发出了挑战，并可能危及亚太

地区的和平”。^①

但是也有海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郑永年认为，人们误解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改革开放使中国民族主义的基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重新崛起的中国民族主义对现存国际秩序并不具有破坏性，因为就国内而言，中国的领导者是将官方民族主义的重建作为其加强政治合法性的手段，就国外而言，中国的领导者也并非想颠覆现存的国际秩序，而是寻求国际社会主要大国对其实力地位的承认，他们虽然倡导民族主义，但却将民族主义引向建设强大国家的方向，并且他们认为只有积极地融入现存国际体系，才能完成他们的既定目标。所以，中国民族主义并不是某种挑战性力量，并不可怕。

赵穗生则从中国领导者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应对和控制来观察中国民族主义的国际影响。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作为加强政治合法性的手段，也可能产生严重的反作用，将面临国内外双重挑战的政府置于一种危险境地。所以，为了均衡其积极意义和消极作用，中国领导者对民族主义一向持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中国政府对民族主义从来没有公开地表示过支持。描述中国民众情感的用词不是民族主义，而是用爱国主义取而代之。因为在中国共产主义者看来，民族主义通常用来指称民族中的狭隘和反动的附属物，更象是一个贬义词。因此在中国，一个尤其令人关注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务实的共产主义领导者为了对抗西方国家所谓的对华“分化”和“西化”策略，一方面在国内有意识地将民族主义培育为团结民众的胶粘剂，但是另一方面，在外交事务中，中国政

^① 《理解中国外交政策：以民族主义为线索》，2004年12月3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816.html>。

府口头阐明的是强硬的民族主义辞令，实际施行的却往往是谨慎的政策行动。^① 赵穗生认为，这种行为模式在中国处理与美国关系时表现得尤其明显。务实的中国领导者努力确保中美关系不被民族主义的辞令所支配。在“炸馆”事件和“撞机”事件期间对反美民族主义表达的控制就是这种务实的外交政策在实践中的成功案例。因此，尽管务实的民族主义在国际取向上是武断的，当中国的国家利益或领土完整受到挑战时表现得尤其强烈，但是它并没有使得中国的国际行为变得具有明显的侵略性。^②

国内学者很少将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外关系联系起来探讨中国民族主义对中外关系的影响，只有少数学者在其文章中谈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对外影响问题。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萧功秦和任丙强。萧功秦在《科索沃危机与后冷战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一文中探讨了中国政府、民众与知识分子在1999年“炸馆”事件中的民族主义的反应，分析了这种新的民族主义的特点与发展趋势。他认为，政府虽然可以运用民族主义资源，抵制西方对中国的威胁，但是民族主义一旦膨胀则会对政府关注的政治稳定构成威胁。虽然目前政府还能有效掌控民族主义，但是由于外部因素的刺激，“由于中国历史、文化与种种因素的结合，这种民族主义存在着走向极端化的极大可

① Suisheng Zhao,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Pragmatic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edited by Suisheng Zhao, New York: M.E.Sharpe, Inc., 2004, p.79.

② Suisheng Zhao,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Pragmatic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edited by Suisheng Zhao, New York: M.E.Sharpe, Inc., 2004, p.84.

能。一旦出现那样情况，其结果将比此次事件严重得多。”^①他预测，极端民族主义与美国的反华强硬派会出现恶性互动，其结果不但破坏两国的合作友好关系，而且持续不断的恶性互动，还会将双方推入新的冷战深渊，中美关系将走向极端与战争边缘。

任丙强在《中国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原因、特征及其影响》一文中认为，9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带有某种扩张性特点，一旦进入政策层面，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进入政策层面，那么除了对周边国家产生威慑外，更会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从而加强军备，导致亚洲的军备竞赛。因此，中国民族主义政策可能造成了四面树敌，群强环视的危险国际环境。”^②所以，对当下的民族主义要认真对待，要将其导向和平、开放的民族主义，避免尚武、狭隘的民族主义。目前，中国民族主义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不足以主导民众情绪，也不足以进入政策层面。然而，从长远看来，它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

（二）关于中国内政与外交相互关系的研究

西方早期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大多从国际关系理论中传统现实主义学派的国家中心基本假设出发，将中国的外交政策视为一个理性、统一的整体，是不断克服外部环境中的各种制约因素力求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产物。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和多元，学者们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国内各种压

① 《科索沃危机与后冷战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2004年9月29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61282>。

② 任丙强：《中国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原因、特征及其影响》，《学海》，2004年第1期。

力和因素的影响，因而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中国外交中的国内因素。大致而言，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

1. 关注中国国内政治。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西格尔（Gerald Segal）的《中国政治与外交政策变革》（*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Reform*）、史文（Michael D. Swaine）与亨利（Donald P. Henry）的《中国——国内变迁与外交政策》（*China, Domestic Change and Foreign Policy*）等。这些著作都将中国内政视作一个整体，探讨其内部变迁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但是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把中国民意当作独立的因素进行专门研究。

2. 关注中国民意与外交政策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中国社会变迁的加快，国外学者对中国外交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加细致。有的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伸向中国内政中的民意因素，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在《改革年代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制定，1978—2000》（*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一书的开篇序言中界定了民意对外交政策的作用，在该书中，费尔施密斯与罗森合写了《中国外交的内部因素：民意重要吗？》（*The Domestic Contex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oes “Public Opinion” Matter?*）一章。在该文中，他们实证研究了1995年到2000年间的中国民意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论证了中国民意在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是美国学者较早就中国民意与中国外交问题所做的专题研究。

3. 对不同群体民众的民意考察。哈佛大学的江忆恩教授在2004年发表《中国中产阶级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初级的

自由化》(Chinese Middle Class Attitudes Towards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scent Liberalization?)一文,分析了北京地区的中产阶级对自由贸易、国际制度、军费支出、美国以及民族主义等问题的态度,他发现中产阶级通常比低收入群体显示出更高层次的初级自由主义倾向。通过数据分析,他得出了某些尝试性的结论:① 某些世界观在整个社会的分布是受阶级或收入地位影响的。② 确实存在某些可能性,即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对外政策态度上支持有限国际主义的那些中产阶级的发展,将使中国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持有或多或少自由主义观点的人群更为壮大。③ 尽管政府希望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应该有一套统一的观点,但数据明确显示,因为利益和偏好不同,人们对主要问题的观点具有明显的不同,而且这些不同存在于各利益群体中。④ 北京的民意对其他国家的行为非常敏感。⑤ 数据结论仅仅反映了北京城市居民的观点,对于北京以外的民意本文没有涉及。^①

2006年,江忆恩与陆伯杉合编《中国外交研究的新方向》一书,其中江忆恩撰写《北京公众对美舆论的一致性研究,1998—2004》(the Correlates of Beijing Public Opinion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1998—2004)一章,他运用民意调查数据,分析了北京公众对美舆论的总体特点,但他仅仅考察了中国民众在对外事务上的态度,并没有进一步研究这些态度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

此外,谢淑丽在《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 Fragile Superpower)一书中认为,民意在当今中国的重要性远大于过

①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hinese Middle Class Attitudes Towards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scent Liberaliz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179 (Sep., 2004), pp.603-628.

去，对领导人已经有了较大的制约作用。互联网已成为中国民众表达情绪的主要途径，对决策者制定政策产生了影响。

内政与外交的相互关系是我国外交学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虽然“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被学界视为外交学的“公理”，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很少关注二者的相互关系，作为改革开放后才开始起步的中国外交研究，更多的还是关注有关中国外交的较为表象的东西，只是在最近几年，外交与内政的相互关系才引起了中国学者的较多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动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当我们的研究深入到对外政策制定的层面，特别是在考察一些大政策的形成时，便不能不分析种种国内因素的影响。二是现实的需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真切地体验到，随着中国内部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社会的变迁，内政对外交的影响越来越大；反之，对外关系的发展对内政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内政与外交之间的互动是十分明显的。”^①

民意是内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由于中国民众的外交参与热情和参与意识不断升温，对中国外交和中外关系的作用和影响逐步增强，国内学者对此开始有所关注，并进行了一些研究，但这些研究基本上是从宏观的社会变迁的视角，探讨中国社会的各种变化给中国外交带来的种种机遇与挑战，民意因素并没有被完全剥离出来加以系统、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王缉思通过对中美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的对比，指出“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中，国际报道所占的比重大大高于美国媒体，中国民众对国际形势和外交问题的关注程度，也大大高于美国民众。这是因为中国对外关系往往涉及到民族存亡。因此，中

① 章百家：《中国内政与外交：历史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

国民众表达意见的方式和倾向性同美国差别很大。”^①就民意与政策的关系而言，他认为“新中国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民意同政策是高度一致的。改革开放时期，随着信息渠道逐渐多元，民众对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的看法也出现了一定分化，开始形成同对外政策不尽一致的一些观点”。^②

张沅生在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变化的若干主要特征时，列举了民意因素的某些变化：“民众对知情权和议政的要求增加、非政府组织得到较快发展、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公众舆论向多元化发展。”^③他认为“公众舆论对外交决策机制和外交政策的影响明显上升，决策环境日趋复杂。民间舆论成为决策中考虑的重要因素，对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既可能是助力，也可能是阻力。由于社会矛盾增多，加之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外交问题、外交政策可能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爆发的导火索和宣泄口。其结果不仅可能对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而且可能对外交政策的施行带来干扰。”^④所以，他建议“更自觉地改进与完善外交决策、协调机制。做出制度性安排，逐步扩大公众对外交的知情权，加强对公众舆论的引导。”^⑤

张清敏将公众参与意识的增强作为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变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公众对外交的关注和参与意识增强，是与社会变迁中媒体的变化紧密相连的。首先，网络的广泛使用大大拓宽了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其次，网络和媒体还

① 王缉思：《中美外交决策的国内环境比较》，《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

② 同上。

③ 张沅生：《社会变迁带给中国外交的机遇与挑战》，《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

④ 同上。

⑤ 同上。